



•历史回溯•

中国植物学述要(1921–1950年)

胡宗刚*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碳中和与生态系统碳汇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江西九江 332900

摘要: 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历史以1950年为重要分水岭。是年,新组建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对此前各研究机构予以重组,植物学进入全新时代。本文所要记述的是1950年之前的历史。自1921年秉志、胡先骕设立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此后又有多个研究所先后创建,各研究所均以从事调查采集中国植物进行分类学研究为主,为编纂《中国植物志》奠定了基础。从中可悉,中国植物学在学科领袖人物的引领下,从学科建立到蓬勃兴起,再到受战争影响而衰落之历史。

关键词: 中国植物学史;秉志;胡先骕;生物学史;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胡宗刚 (2025) 中国植物学述要(1921–1950年). 生物多样性, 33, 25235. doi: 10.17520/biods.2025235; cstr: 32101.14.biods.2025235.
Hu ZG (2025)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botany (1921–1950). Biodiversity Science, 33, 25235. doi: 10.17520/biods.2025235; cstr: 32101.14.biods.2025235.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botany (1921–1950)

Zonggang Hu*

Jiangx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Ecosystem Carbon Sink, Lushan Botanical Garden, Jiangxi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iujiang, Jiangxi 3329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otany takes 1950 as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mark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previo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der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advent of a new era in botanical science. This article chronicles the developments before 1950, beginni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biology department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by Chi Ping and Hsen-Hsu Hu in 1921. Subsequently, several research institutes were founded, primarily dedicated to the collection and taxonomic study of Chinese flora. These effor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lora of China*. This historical overview illustrates how Chinese botan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minent figures, evolved from its inception to a period of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and then declined under the impact of war.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botany; Chi Ping; Hsen-Hsu Hu; history of biology;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自然科学由多门学科组成,各门学科多源于西方,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是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渐渐深入,始由科学知识传播、成立一般学会组织、主办通俗性报刊,到创设专门研究所、出版专门学报,才实现各学科之本土化、建制化。此中之生物学研究事业,系在秉志、胡先骕等引领之下,得以开创。

1 引言

中国动植物资源,因国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端,而蕴育出极为丰富之种类。在清朝中叶,西方科学已经兴起,西方动植物学家已洞悉中国动植物资源,而不断派人前来采集,运回所在国,以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予以研究,并发表其研究所得,是为中国植物学之开端。1861年开始洋务运动,“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引进西方技术，植物学因与农业生产有关，而被涉及，有所引入。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西学全面传入，植物学与动物学、矿物学并称博物学，一同在学堂讲授，所聘教员多为外籍人士。此时，仅是知识之传授，而无研究之可言。

西学初兴，带来出国留学热潮。由于东邻日本引进西学早于中国且获得成效，也由于旅行便利，于是前往者众。但在日本留学多为速成，其中习植物学者回国，尚不能开展研究，只是受老师之托，代为采集植物标本，如黄以仁、张宗绪等；也如吴家熙者有志在中国建立新学科，1914年2月，联合同志在上海设立中华博物研究会，创办《博物学杂志》，还拟创办研究所，后因无从筹得经费，未遂其志；此前所办学会、杂志也不得不终止。钟观光为中国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第一人，受北京大学之聘，于1918年开始，途经十余省，所得甚多；但限于分类学研究能力，未能深入，其本人后关注于中国本草之考证。

中国开办新式学堂未久，一些外国教会或组织来华开办私立大学，著名者有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其所聘来华教员中，有具研究动植物学能力之学者，在教学之余，开始采集中国植物，并摸索研究，对不能鉴定者，则请教国外专家。时美国植物学家梅尔(Elmer Drew Merrill)在菲律宾任科学局局长，1916年被岭南大学邀请来华，对该校所采标本予以鉴定，并协助建立植物标本室；1920年梅尔又受金陵大学之邀到南京，也为金陵大学设立植物标本室予以帮助；而东吴大学也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并成立生物系。但是，这些在华外籍人士均未有将生物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化之宏愿，仅在有限范围内开展一些其本人感兴趣且又力所能及的研究项目而已。

在放洋留学潮中，也有少数远赴欧洲、美洲之学子，或者其中精英成分更多，且家境殷实，先在国内受到良好传统教育；或者对近代中国丧权辱国之耻感受更切，更能体会科学救国之要；或者所受科学教育和训练更纯正完备，故而开创中国自然科学之使命便落在他们的肩上。在自然科学中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等普遍性学科，也有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这类地域性之学科。一般而言，地域性学科与国家建设更加密切，更为需要，故应优先发展。1913年丁文江、翁文灏创建了农商部地质调

查所，此为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跟随其后，是1921年秉志、胡先骕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为国家所办，经费尚属充足；生物研究所则系民间所为，其发展更为艰难，但中国生物学却由此发轫而来。

2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之生物系

一项事业之兴起与其主持者有莫大之关系，一门学科之创建则期待学科领袖之出现，中国生物学因有秉志而建立。秉志([附录1](#))于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留美(以美国退回庚子赔款设立留学官费)，入康奈尔大学生物系，1918年以研究咸水蝇获哲学博士学位。此时，秉志已有回国之后在中国开创动物学之志愿，但他却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申请费城韦斯特解剖生物学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的研究员津贴，在该所从事人体解剖和白鼠交感神经节细胞生长研究。之所以如此选择，乃是欲涉足更多动物学领域，对该学科有更全面的认知；此外，其还关注该所之历史及组织管理等，意在回国创办研究所，即依照韦斯特解剖生物学研究所向社会募集经费，单独建制，却又依靠费城大学的模式。1920年秉志回国之前作《韦斯特报告》，其叙言云：

敝人游美十年，羡其国内教育之发达，专门学者之日众，影响于社会及国是者至大且深；于是而知凡国家之欲强盛者，不能不恃学术也。美国大学如林，各有专美，欲悉数陈述，虽赖祭群籍，汗漫岁月，犹未易竟事。兹篇所言，不过一研究所之内容，惟其所以经始、所以成立、所以发达及其现在所行之政策，有为吾国人所当注意者、效仿者，且当善用之，以为吾国学界益者。愿国人读此文者，毋河汉之也。^①

由此可知秉志理想之所在。现实中，秉志出国之前已有婚约，在美滞留十余年不归，其丈人不断催促，遂于1920年归国。秉志归国之时，其学术声誉已享誉国内，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争相聘请，而他却选择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以践与农业专修科(以下简称农科)主任邹秉文之约，任动物学教授。秉志认为依托该校可以实现其理想。其时，此前在美国成立之中国科学社社所已迁回国

^① 秉志 (1920) 韦斯特解剖生物学研究所报告. 北京大学日刊, 5月24、25日.

内，设于南京，大多科学社社员也在南京就职，在南高者甚多，而在农科，除邹秉文外，还有胡先骕、原颂周、张巨伯等。中国科学社有设立研究所计划，秉志是科学社主要成员，与社长任鸿隽交谊深厚。为实现理想，秉志认为科学社也是其依靠之力量。

先于秉志进入南高农科之胡先骕([附录2](#))，1912年考得江西省官费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习植物学，1916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回国。胡先骕在美之时，已获悉西方人在华采集大量植物，而这些被外人珍视之物，却不被国人所知，遂有志于归国之后也进行采集，并予以研究。但是，胡先骕回国之时，求职却不如意，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都拒绝了他，只好往江西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难遂其志，1918年受南高农科主任邹秉文之聘，来南京任园艺学教授。在南高，学校也无经费提供予胡先骕外出采集标本，但校长郭秉文、农科主任邹秉文却为其筹集。其时，国内学校博物学课程中，讲授植物学所用植物标本多购自日本，而日本植物与中国植物有所不同，难以切合实际。南高校长郭秉文即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孙其昌商量，由四校联合发起，邀请国内各类学校出资，派胡先骕赴四川、云南采集植物标本，将来采集所得，按出资多少分配标本于各校，获得赞同。有教育界权威人士领衔倡导，且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32所学校或机构积极响应，其中大学7所，中学24所及商务印书馆，参与数超出预期；而筹得经费共18,000余元，也超出预期之一倍。

在筹集经费之同时，胡先骕与曾深入四川采集之英国人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取得联系，询问野外注意事项，购买采集装备及威尔逊所采标本，得其指导。但临近出发之时，因川滇治安不靖，威尔逊建议胡先骕赴浙江、江西采集，云此区域未曾被西人注意，值得前往采集；于是胡先骕改变计划，于1920年夏往浙江、1921年春往江西采集。

1919年冬，在胡先骕筹集采集经费之时，秉志来到南高加入农科，他们均有在中国开展动植物研究之志，遂于1920年春在农科成立生物系，此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公推秉志为系主任([附录3](#))。在中国开展生物学研究，秉志早已成竹在胸，高瞻远瞩、系统谋划，撰写《计划书》，将采集动植物标本列为生物系首要之务；于是秉志也仿照胡

先骕而筹集采集沿海水生动物经费，只是所得不多，于1921年夏前往吴淞、烟台、宁波等处沿海采集。

生物系成立不久，南高并入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22年9月，秉志因不愿耽搁于行政事务，而胡先骕对生物系成立贡献甚多，且又有办事才能，乃向校长提请辞去生物系主任，而推荐胡先骕继任。1922年之后，生物系人员还有钱崇澍([附录4](#))、陈焕镛([附录5](#))、姚传法、陈桢等加入，并将农科近年毕业优秀学生留校任助教，共有十余人。钱崇澍系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1914年入伊利诺伊大学理学院，1915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植物分类，1916年毕业回国。留美期间，在美刊发关于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论文，此为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第一人。回国之后，在南京甲种农业学校任教，此转而来东大。陈焕镛14岁赴美求学，中学毕业后入马萨诸塞州立农学院习森林学和昆虫学，1912年转入纽约Syracuse大学森林学院继续深造，191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19年毕业之后即回国，翌年春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深入五指山，10月染上一种热带高热病，被人以担架抬出大山。陈焕镛系海南植物采集第一人，其标本价值甚高，惜屡遭火灾，留存不多。其本人经其姐丈凌道扬推荐至金陵大学任教，却因与美籍人士难以相处，而被胡先骕聘请来东大。

胡先骕在浙赣采集所获标本分配给出资之各校，告知已鉴定之学名，及如何制作成腊叶标本、如何收藏；而不能鉴定者，则将部分标本寄予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之雷德(A. Rehder)和德国柏林植物园之笛而士(Ludwig Diels)，请两位协助鉴定。其时，生物系刚刚设立，没有文献，没有标本，对此前西人在华所采所知也少。胡先骕所采标本经国外专家鉴定，其中有新奇之种类，果如威尔逊所预见。采集获得成功，为东大生物系建立起标本室，也为胡先骕学术成长奠定基础。为了鉴定所得全部标本，并探明此前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植物成果，胡先骕拟再次出国留学。经陈焕镛介绍，联系到哈佛大学，并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其出国经费，经学校向教育部及江西省政府联系，以补缺方式，获得江西省官费；学校则鉴于胡先骕留学之于中国植物学之重要，发放全额薪津。因种种原因，迟至1923年才放洋。胡先骕出国，但其与各校许诺采集标本任

务尚未完成，生物系乃聘秦仁昌为采集员，继续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采集；1922年暑期，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等还一同赴湖北宜昌一带采集。胡先骕出国之后，生物系主任一职又由秉志担任。

胡先骕在出国之前，还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完成《高等植物学》教材一部，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植物学教学水平不高，与没有适合中国国情之教材大有关系。在生物系成立之前，胡先骕与邹秉文即已开始着手编写，待1920年钱崇澍来校，遂加入其中。此乃中国现代植物学第一部大学教科书。该书之通论和分类两章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之编著体例，首先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支离破碎之毛病；分类则根据生物进化之原理，由简单低等类群逐渐到复杂高等类群。胡先骕还凭借其对汉语语言文字之修养，改正了原先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更正后的术语被沿用到现在。邹秉文负责植物病理学部分，钱崇澍负责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部分。

南高和东大设定农科之办学目的，本为“农业学校”培养教员，但秉志、胡先骕却有更高要求，以从事研究相期许，经其训导，后涌现出一批专业人才，此列举其后成为知名学者名单如下：孙宗彭、金善宝、寿振黄、吴福桢、曾省、邹钟琳、童士恺、周拾禄、王家楫、伍献文、冯泽芳、杨惟义、喻兆琦等，其中不少为动植物学家，继秉志、胡先骕之后，为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重要人士。生物系成立之后，培养人才更多，仅以1927年毕业生为例，著名者有沈嘉瑞、谢肥诚、汪发缵、耿以礼、陈封怀、唐耀、左景烈、李鸣岗等。1927年，东大改组为中央大学，秉志、胡先骕等大多前生物系教授都离开东大(附录6)。

3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秉志、胡先骕在南高和东大成立生物系，虽已展开动植物学研究，但在大学体制之下，许多事务并非生物系可以自行掌握；然而研究事业需要长久稳定之机制，需要持续不断研究，才能作出成绩，研究所机制相对合乎于此。创办生物系，培养人才，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依靠中国科学社，创办研

究所才是终极目标。

生物系成立之翌年，南通民族实业家张謇允捐1万元于中国科学社创办研究所，于是科学社在文德里社所南楼辟出几间房屋作动植物标本陈列室和研究室，于1922年8月18日举行生物研究所成立典礼。秉志任所长，所内设动物、植物两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任主任。研究人员多系东大生物系教员，以业余时间在此从事研究，而东大学生中有志于从事研究者，则吸纳在此接受训练。

然而，张謇允捐之款并未兑现，导致生物研究所处于尴尬境地，起先若无此承诺，不会冒然成立；现在已成立，则不可轻言撤销，否则有损声誉。仅依靠科学社每月240元经费以维持动植物标本陈列和个人专题研究，而于采集几乎不能进行。此时，胡先骕已赴美留学，由秉志苦苦支撑。至1925年，已有多篇论文完成，并开始编辑出版*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之所以不惜有限经费编辑出版刊物，乃是与国外生物学研究机构交换之迫切。国外学者阅读此刊，谓中国人原来也有研究能力，为国赢得声誉。

生物研究所出现转机在1926年。上年以美国第二次退回庚子赔款设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成立，中国科学社以生物研究所事业向该会申请资助获得准予，自1926年秋起每年资助1.5万元，连续3年，1926年还补助建筑费0.5万元，用于建造实验室。至此，生物研究所暂时获得稳定之经济来源。

胡先骕于192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曰 *Synopsis of Chinesis Genera of Phaenogams with Descriptions of Representative Species* (《中国植物志属》)。该文打印成16开本，有千余页，装订成3卷册，可见两年付出心血之多。在此两年中，胡先骕利用哈佛大学比较齐全的图书、标本等优越条件，对中国有花植物进行较全面之整理。记述了1,950属3,700种中国本土植物，还包括小部分外来栽培植物。当时已知中国植物约有1.5万种，且每年有300新种被发现，胡先骕的研究范围虽有减小，但其难度还是可想而知，再加上被一些西方学者研究过的种类并不十分正确，需要花费时间去重新查对标本，校对描述，而有些标本在哈佛大学

并非全有收藏；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吸收植物分类学的新成果。该书稿后未正式出版，作者认为还待修订，然终未如愿完成。其时，国内文献缺乏，该稿被辗转抄录打印数十次，存于全国各大植物研究机构图书馆。尽管生物研究所在其报告中不曾将该书作为研究所之研究成果，但其对生物研究所植物分类学研究乃至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至关重要，此前所采标本需要寄往国外，请外国专家鉴定，今据此可作初步鉴定。能鉴定新的类群，被看作是学术独立之标志。胡先骕在哈佛大学留学时还与阿诺德树木园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

胡先骕回国之后，继续执教于东大，此时农科生物系分为动植物两系，胡先骕任植物学主任；并续任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1926年8月，第四届世界植物学大会在美国召开，胡先骕派时在美国的已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张景钺代表中国科学社就近参加。会后，张景钺回国，被胡先骕邀请来东大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邀请东大讲师秦仁昌和东大助教严楚江来所，分别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解剖学研究。植物部研究项目有：秦仁昌与胡先骕共同发表中国榧属(*Torreya*)之研究；严楚江有菊科植物花之比较解剖、草甘遂之细胞学两项；张景钺有欧洲蕨(*Pteridium aquilinum*)根基组织之发源与发达初步之观察，以及梧桐之解剖和芭蕉根之解剖等；陈焕镛已完成中国山毛榉科之分类，后主要与胡先骕合编《中国植物图谱》，他们研究发现的新属新种大半在本书中发表，尤为关注有经济价值的本土树种等；胡先骕个人则发表其重要论文《杰克木中国南部安息香科之新属》。

植物标本采集则全力以赴。1927年夏秋，耿以礼赴浙江温、处、台各州采集，又津贴黄昌裕赴四川南川、江津一带采集；第二年年初耿以礼继续在浙江严州、衢州、金华、台州各处采集，胡先骕于夏间往西天目山采集，金维坚在金华采集；1928年获美国阿诺德树木园资助，派方文培在四川作长期之采集。

此后，中国科学社事业也得到发展，在上海建发明复图书馆和社所，而迁往上海，南京房舍则全归生物研究所使用；且得中基会资助，兴建一幢实验楼(附录7)，至此才可谓为一个较为完备之研究所。1928年胡先骕北上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由钱崇澍担任。其后，有1930年郑万钧

在西康采集；1934年吴仲伦与中央大学农学院陈谋赴云南采集；1935年派郑万钧参加实业部浙赣闽林垦调查团，赴3省调查采集植物。专科专属研究有：钱崇澍之于兰科、荨麻科；郑万钧之于裸子植物；裴鉴之于马鞭草科；孙雄才之于唇形科；方文培之于槭树科；耿以礼之于禾本科；邓叔群之于真菌；王志稼之于长江淡水藻类等。

生物研究所依靠中基会资助而得发展，1929年起资助额度每年增加至4万元。除此之外，无其他借助，若中基会资助一旦发生变故，则此十余年惨淡经营之事业便失去支撑，难免枯萎。为谋长久计，生物研究所于1933年发起向社会募集基金活动，所得基金参股于中国科学社所办中国科学出版公司。此后数年均积极募捐，至1936年共得4万余元。

4 再创多个研究所

秉志、胡先骕等，非器小易盈之辈，没有因创立一二机构即心满意足，其后则是死守旧业，最多偶尔光大一下即可。中国幅员辽阔，动植物资源之调查采集，远非一二机构可以担任，也非一时可以穷尽，他们在开展中国生物学研究事业之初，即具全局观念，尽可能多设研究机构。

4.1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5年之前，由留日归国学者组织之尚志学会，曾在北京兴办文化事业，但均未获得成功，进而想创办一项持久事业，其会长范源廉(字静生)对生物学甚有兴趣，乃请丁文江为其组织成立一生物研究所。丁文江重秉志之名，请其兼任所长，拟由尚志学会、中国科学社、东大三家合办。然尚志学会出资有限，秉志正为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难以发展而苦恼，不愿重蹈覆辙，没有接受丁文江邀请。迨中基会成立，范源廉出任干事长。1927年9月中基会延聘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来华访问，目的在于“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秉志、邹秉文、胡先骕认为中基会应借尼丹之力，请其在北京组织设立生物研究所，致函范源廉，旧事重提，得到赞同；然在酝酿之中，范源廉不幸去世。1928年任鸿隽继任中基会干事长，为实现范源廉遗愿，继续筹备，于10月1日开办，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以纪念范源廉。秉志兼任所长，所内设动物部、植物部，分

别由秉志、胡先骕主持。秉志每年来北平在所工作两月，平常所务由胡先骕代理，1932年因秉志不能兼顾南北两所，改由胡先骕担任所长。该所经费由尚志学会出资15万元作为基金，交由中基会保管生息；而常年经费由中基会下拨。在抗战之前，最多年份曾达9万元。有此充足经费，该所人数最多时曾达50余人，是民国时期国内最大生物学研究机构。

静生所开办之初，以范源廉家人捐献石驸马大街83号范源廉故居为所址，1931年中基会出资在文津街兴建一幢三层楼房为新所址([附录8](#))，旧址则改为通俗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动植物标本等，传播科学知识。静生所植物部之采集，先有1929年李建藩在河北，1930年唐进在山西，汪发缵在四川采集；后于1932年开始致力于云南采集，依次派出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不曾间断达七、八年之久，获得大量新种，成绩好于前人。植物部之研究，主要有胡先骕继续种子植物研究，秦仁昌之于蕨类植物、李良庆之于藻类、周宗璜之于真菌、唐进和汪发缵之于单子叶植物、唐耀之于木材、王宗清之于植物细胞学等，研究所得多刊于本所编辑出版之 *Bulletin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植物园如同植物标本室、实验室一样，是植物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开创之时，即有开辟植物园的计划，但仅是计划而已，无从实施。胡先骕留美时，与阿诺德树木园商定，共同在南京设立植物园，后因北伐战起而未成。静生所成立后，胡先骕也在北平寻找地址，依然无结果。当1933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其回江西问策如何发展经济，胡先骕建议成立集农业行政、教育、研究于一体的农业院，得到赞同。翌年，胡先骕又提议由静生所与农业院在江西庐山合办森林植物园，也得熊式辉赞同。植物园遂于1934年8月20日成立，全园面积4,419亩([附录9](#))，胡先骕委派秦仁昌南下任园主任，并派陈封怀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专习植物造园。植物园旨趣分为“纯粹植物学研究与应用植物学研究”两个方面，以裸子植物和高山花卉为主要引种对象。静生所在云南采集，也为该园采集种子和球根；与国外60余所机构建立种子交换关系。至1938年，开辟有多个展览区，引种达3,000余种，已具国际声誉。

4.2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27年春，国民政府即将定都南京，即为成立“中央研究院”。翌年“中央研究院”组织广西科学考察团，请秉志、胡先骕为调查团推荐主持动物和植物调查之人选，胡先骕推荐秦仁昌负责植物组，秉志推荐方炳文负责动物组，还有陈长年、常麟定参加。经过近一年调查采集，所得甚为丰富。返回南京之后，关于如何研究这批珍贵标本，“中央研究院”乃决定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秦仁昌、方炳文即受聘于该馆，分别主持植物部、动物部；博物馆主任则由钱天鹤担任，馆址与生物研究所同在成贤街([附录10](#))。1930年秦仁昌得中基会资助，赴丹麦京城大学，跟随克瑞斯登(C. Christensen)研究蕨类植物。在研究之余，曾与陈焕镛、张景钺一同参加在英国举行的第五次世界植物学大会；还曾在英国邱园等机构拍摄中国植物标本照片，共达1.8万张。模式标本是鉴定植物的主要参考资料，其时，一般分类学研究者出国不易，借此照片，也可达到一定作用。此照片于中国植物学本土化有莫大贡献。秦仁昌在出国之前，博物馆主任钱天鹤承诺为此项工作筹集经费，但没有成功；是胡先骕向中基会申请到3千美金，才得付诸实施。当1932年秦仁昌回国之时，没有回到博物馆，而是加入静生所，任植物标本室主任。

秦仁昌出国之后，博物馆植物部聘请蒋英来主持，曾组团赴贵州、江西采集，其本人致力于中国夹竹桃科之研究。该馆成立后，也编辑出版刊物 *Sinensis* (《生物丛刊》)，主要刊印所内人员研究成果，用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交换。

“中央研究院”有多个研究所，但各研究所发展不均衡，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几年，成绩平平。1934年丁文江出任研究院干事长，改组博物馆，拟与学术声望正隆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合并之后，经费有所增加，秉志仍为所长，但受制于人，不合秉志开办研究所之初衷，不为赞同。最后，只是将博物馆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秉志同意门生王家楫前去任所长。改组为研究所后，在此研究植物学者有邓叔群、耿以礼等。

4.3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1926年陈焕镛休假一年，南下香港，在香港植物园从事研究；第二年往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

担任理科植物系主任。未久，理科植物系与动物系合并为生物系，辛树帜自德国留学回国，也来此任教，并接受其德国柏林大学导师笛而士指导，组织生物调查团赴广西瑶山采集，后大获成功。陈焕镛不仅没有参与，而且在此时还脱离理科生物系，于1928年秋在中山大学农科设立植物研究室，一年后扩充名之为研究所，曰“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附录11\)](#)。

农林植物研究所初设在东山石马岗农科所属之楼之三层，后迁入法政路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研究室成立后，采集工作主要由蒋英、左景烈担任，采集地点为鼎湖山、高州、罗浮山、乐昌等地。扩充研究所后，人员增加，主要采集人员有陈念劬、左景烈、侯宽昭、陈少卿、高锡朋、黄志、梁向日等，因而进入大规模采集阶段。陈焕镛为之制定采集方法及详尽采集计划。植物研究所建立之目的为编纂《广东植物志》，故以广东全境为采集范围，根据广东山川河流走势，划分为若干区域，逐年采集。至1933年有标本共计3万余号。1930年出版*Sunyatsenia* (《中山专刊》)，刊载研究所得；1931年在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内，开辟植物标本园，栽培苗木约5千号。农林植物研究所之标本，从采集、制作，到研究、鉴定，文献搜集、整理等，均经过严格过程，故其质量在国内首屈一指，极富科学价值。

农林植物研究所也得中基会资助，1935年，中基会认为广东、广西植物应一并研究，促成陈焕镛与广西大学合作，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兼任所长，其成员主要有钟济新、陈立卿、李树刚等，建立起植物标本室，开展广西植物采集。

4.4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

1928年9月北平研究院成立，李煜瀛为院长，院下设多个研究所。因李煜瀛为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且为留法学者领袖，组织北平研究院主要成员及各研究所所长多为留法学者担任，其中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即聘尚在法国之刘慎谔出任[\(附录12\)](#)。9月刘慎谔回国，植物学研究所随即成立，设于北平西郊天然博物院内，后于1934年建筑3层大楼陆谟克堂为所址[\(附录13\)](#)。建所之初聘请夏纬瑛、孔宪武为助理员，后又招收王作宾、刘继孟为练习生；翌年林铿自法留学回国加入，其后加入者还有王云章、钟补求、郝景盛等。

该所致力于华北、西北植物调查采集，自1929年至1936年，刘慎谔、王作宾、刘继孟等先后至河北、吉林、陕西、新疆等地，得标本2万余号。1936年为致力于西北植物采集与研究，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陕西武功合办西北植物调查所。抗战爆发，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中人员多疏散至此。

1930年4月植物学研究所在北平西郊公园内原农事试验场蔬菜园之旧址上兴建植物园，占地约40亩。此园系与国立天然博物院合办，名曰“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植物园”。园中植物依恩格勒分类系统次序种植，第一年便搜集植物有500多种。第二年则注意搜集较远处的高山植物，春季由东陵雾山采得树苗及宿根约百种，至1934年，植物种类已近2,000种。可惜的是在1935年北平市长要求收回植物园土地，改种白菜，植物园被迫中断。

1931年*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创刊，主要刊载本所人员研究所得；是年又开始编辑出版连续出版物《中国北部植物图志》。

4.5 小结

以上列举诸研究所，为其时重要者，余尚有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河南博物院等，此等暂为省略。仅以所举者，除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是由留法学者创办并主持外，其余均从南高、东大发展而来。在设立诸多研究所之同时，国内各大学也纷纷设立生物系。这些生物系也多受东大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影响，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等，不一而足。胡先骕在1936年言：“东大生物系人才辈出，迄今有六生物学研究机关，皆为南高旧日师生所主持，而七大学之生物系，皆有南高师生任教授，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于此，生物研究所《1934年报告》所述更加详细，有云：

本所于成立之初，即以促进文化，努力学术自励，凡可效劳，靡不尽力。故历年以来，所以扶翼各机关者颇瘁心力，实例以证。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倡立，此间实为其筹措规划，执事人员多为前时本所之职员，不啻为此间之新枝。最近以两者关系密切，缔约相结，已为联盟之集团矣。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与之切，尤逾寻常，书物标本互为交惠，采集研治常相合作。今日该馆技师专

家，尽是前时本所之研究人员也。河南省立博物馆与四川之西部科学院，关于生物学之工作程序，皆由此间为之策划。去年冬间，南通农校专校，求为规划昆虫及菌类之研究计划。最近又因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之委托，遣人往赣省调查产物，尤注意于鄱阳湖之鱼类。国防委员会惠邀调查长江流域之植物状况，及经济树木种类，亦曾略效驰驱。秋间又将远发西北，与该会合作搜求边疆之经济植物种类。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其教授大率为此间研究专家，彼等自大学所得之薪金，不以自殖而移注于所内，以为研究需耗之费。^①

诸研究所在十余年间，先后创办建立，于是中国生物学兴起，在民国自然科学各学科中，其成就仅次于地质学。

5 日军侵华，各研究所遭受重创

科学研究事业在和平时代才能得到稳健之发展；然中国植物学事业刚刚步入上升期，即遭日军侵华，由盛转衰。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受到威胁，北平静生所胡先骕即安排在南方设立分所，以便迁移，狡兔三窟是也，庐山森林植物园即是在此背景下创立。当1937年初战事日益迫近时，中基会却未安排静生所南迁；北平沦陷后，因静生所系依靠美国退回之庚子赔款所办，此时，只得依靠美国在华势力而维持。

战争一开，江西庐山或也不保。此时，静生所在云南采集已有多年，始终得到云南省教育厅之支持，胡先骕乃与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量，由静生所与教育厅在昆明合办农林植物研究所，得其同意。1938年遂派前曾在云南采集之蔡希陶赴昆明筹办，选定昆明北郊黑龙潭为所址([附录14](#))，可使北平、庐山西迁人员在此继续研究，先后抵达有汪发缵、张英伯、王启无、俞德浚等。然而此地可供使用之房舍仅有原有之道观，当1938年秦仁昌率领植物园人员至此，房屋已不敷使用，乃再往西，至丽江设立工作站，以便探寻高山花卉，将来可携回庐山。胡先骕于1939年因在北平受到日军怀疑为抗日分子，不得不南下，即到昆明主持该所。为提升该所学术地位，自任所长。此后一直兼任，而副所长先后由汪发缵、郑万钧、俞德浚、蔡希陶担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诞生于战时，其经济一直窘迫，却坚持

不坠，在最困难时期，还试种烟草，获得适宜品种，促使其后成为云南省支柱产业。

静生所自1930年起致力于木材学研究，由唐耀主持。后唐耀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唐耀回国之前，胡先骕已与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顾毓瑔商定，待唐耀学成回国之后，由两所合作开展木材学研究，1939年，唐耀回国，遂在重庆开办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室，1949年迁往乐山，并升格为木材试验馆。

1940年10月，胡先骕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回江西泰和出掌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借此，胡先骕在该校设置静生所工作站，并在大学设立生物系，使得静生所人员来此既可兼任教职，又可从事研究，在此还出版一期《研究汇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交恶，美国在华机构被日军占领，受美势力保护之北平静生所也被日军占据。在江西之胡先骕闻悉，致函中基会前干事长任鸿隽，有言：

(静生所)若全部损失，则惟有索偿于痛饮黄泉之后矣。此事始谋，不至陷入如此窘境，在基金会方面不过损失一二百万之金钱，在同人则十余年耗尽精血所搜集研究之材料，将沦于敌手，宁能以数字估计其损失？每一念及，血为之沸。弟壮年期最佳之十年已贡诸静生，万一事业尽付东流，真将撞翻至牛，疽发于背矣。国外生物学泰斗咸以静生之安危为念，而乃误于昏庸之手，宁不令人狂易乎？^②

由此可知，科学家之研究事业何等重要；若遭毁灭，又是何等悲愤；由此可知日军侵华，给中国科学造成何等灾难。于中国生物学而言，不仅是静生所，其他各所多如此。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沦陷之前，已将重要标本和图书，请卢作孚民生公司轮船运往重庆北碚之西部科学院，后在该院帮助之下，在北碚设所。而在南京之所址，仍留存不少标本、图书、仪器等，但在日军进城后，纵火焚毁，全部化为灰烬。此一民间研究所，何以遭此毒手？乃是1928年有日本鱼类学家，来中国调查长江鱼类，生物研究所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使得日本人在华采集受到限制。其后，该日本鱼类学家在成都突然病逝，生物研究所遂被日本人仇视，即而遭到焚毁。西迁重庆

① 中国科学社 (1934) 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纪事录。

② 胡宗刚 (2008)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

之后，所长秉志因夫人患心脏病，不能长途跋涉，而困于上海，后隐姓埋名，在震旦大学和明复图书馆等处继续研究和著述。在重庆，由植物部主任钱崇澍代理所长，前几年尚能开展研究，为解决战争期间国家所面临具体问题，并在北碚建造一幢二层简易楼房；其后，经费断绝，虽得到政府少许补助，但还是无法支撑，于1944年停办。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在地广州，被日军占领稍晚，当陈焕镛获悉静生所、生物研究所近况后，认为国人所开办之生物学研究机构几遭全毁，仅剩其一家，更有责任和使命予以保护。在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之前，1937年底至1938年1月，陈焕镛自筹搬迁费用，利用其家族在香港之房产，将标本等重要物品运往香港，大多研究人员也随之撤往。后在香港九龙围道建造房屋，名之“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继续开展研究。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后不久，又迁粤北，蒋英自香港到粤北，依学校农科恢复农林植物研究所建制。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此为陈焕镛始所未料，为保全标本，乃与汪精卫伪政权合作。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与陈焕镛同为广东新会人，有此层私人关系，伪广州市政府派船只将标本等运回广州，存于伪政府利用岭南大学校址开办之广州大学，陈焕镛也在此大学任教。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据研究院安排，在所长王家楫率领下，先自南京迁往长沙，又迁往桂林，最后在重庆北碚落脚。动植物研究所之迁移，由于准备较早，重要书籍、仪器及模式标本皆无重大损失。但运走标本不过全数之五分之一，其余尚留南京所中。在南京沦陷后，被日本人所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接收，并运往上海。1939年1月，动植物研究所迁至北碚，遂与西部科学院联系，借用该院土地，兴建所址，主要人员有专任研究员邓叔群、伍献文、陈世骧、饶钦止；助理员单人骅、欧世璜、刘建康等。在北碚，动植物研究所与生物研究所毗邻，在战时状态下，所况大致相同，但由于系政府所办，尚可维持。

1944年2月，“中央研究院”对动植物研究所予以改组，分设动物研究所与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王家楫继任所长，植物研究所则聘请罗宗洛为所长。罗宗洛1922年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植

物科，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植物生理学，但迟至1936年获得学位，期间曾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此系自遵义浙江大学来重庆，接受“中央研究院”聘请。罗宗洛主持植物研究所后，所内设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有裴鉴、单人骅、刘玉壶；设藻类研究室，有饶钦止、黎尚豪；设植物生理研究室，有罗宗洛、黄宗甄等。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未雨绸缪，于1936年便在陕西武功设立西北植物调查所，北平沦陷前已有部分人员在此工作。战争全面爆发后，所长刘慎谔率大多人员来武功，设置研究室，并开办植物园。主要人员有夏纬瑛、林容、王振华、钟补求、王作宾、刘继孟、傅坤俊等。林容于1942年赴福建永安创建福建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其后新增人员有王云章。植物学研究所在武功，以西北植物调查所名义运行。1941年初刘慎谔至昆明，为恢复植物学研究所名义，以获得北平研究院下达更多经费，其本人曾到大理采集，其后在昆明仅设立工作站。

6 战后复员及旧时代终结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之胜利。在短暂庆祝之后，后方之机构均急切返回战前所在地，恢复正常的工作；然而，经过战乱，国民经济亏空，通货膨胀日甚一日，民不聊生，研究事业复员艰难。然未及几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诸研究所被整合改组，又进入新的时代。

抗战胜利时，胡先骕在江西，已卸任中正大学校长而任该校教授；1946年返回北平，在文津街所址主持静生所复员。然事与愿违，中基会的贊助力度远未达到战前的水平，胡先骕拟将静生所改隶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但几年下来，多番努力，了无结果。其复员仅勉强恢复植物部，其人员有胡先骕、唐进、张肇骞、傅书遐、夏纬琨、吕烈英、冯澄如等几人。在此条件下，至1949年初，静生所还是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绩。与中央林业实验所合作完成滇南、赣北森林植物调查，由静生所下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庐山森林植物园分别担任；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一书，该书计划出版10卷，此仅出版胡先骕撰写的第二卷桦木科、榛科。《研究汇报》出版二期，尤其是活化石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W. C. Cheng)的

发表, 轰动国际。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复员由在福建之林镕先返回北平负责, 所址仍在陆谟克堂。1947年刘慎谔回到北平, 即而主持植物学研究所。按刘慎谔设想, 北平作为研究中心, 而武功、昆明主要从事采集工作, 故大多研究人员回到北平, 有汪发缵、夏纬瑛、匡可任、简绰坡、崔友文、王云章, 1948年11月郝景盛也回所工作。保存在武功、昆明的标本、图书也陆续运回北平, 而西北植物调查所改由王振华负责, 昆明农林植物研究所则由朱彦丞负责。

在抗战胜利后, “中央研究院”接收日本在上海岳阳路320号设立之自然科学研究所, 院属多个研究所在此复员, 植物研究所分得房屋十余间, 另有标本室。先前将北碚所有设备全部经水路运至上海, 还接收一些日本人所遗植物标本及植物学图书, 其中包括抗战期间被日本人自南京动植物研究所掠夺而来的标本, 可谓是失而复得。在所长罗宗洛主持下, 全所人员增至30人, 其中专任研究员6人, 分别主持6个研究室, 除先前在重庆设立3个研究室外, 还增加邓叔群主持真菌学、森林学研究室, 王伏雄主持植物形体学研究室, 李先闻主持细胞遗传学研究室, 魏景超主持植物病理学研究室。1947年3月还创办*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汇报》)。由于“中央研究院”为国立机构, 其经费相对充裕, 故其植物研究所复员好于院外研究所; 其研究领域和规模不是缩小, 而是有所扩展。

中山大学自粤北迁回广州石牌, 植物研究所由岭南大学之康乐园迁回法政路, 并恢复原名, 继续隶属于农学院。此时所长陈焕镛因保存标本与伪政府合作, 受到汉奸罪名指控, 改由蒋英代理, 后又改隶于理学院。1946年7月蒋英赴台湾工作, 所长由吴印禅代理。1946年12月30日广东高等法院对陈焕镛案作出“不起诉处分书”, 得到公正判决, 其后曾恢复所长职务。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胜利之前已停办, 钱崇澍及科学社还是将其物品分批自重庆运回上海, 因运费由复旦大学支付, 故将图书借与复旦使用3年。秉志得实业家资助, 继续在明复图书馆进行一些实验, 将生物研究所名义予以恢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拟对此前全国之研究机构予以重组, 首先将“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所合组为中国科学院, 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在植物学领域, 鉴于此前二十余年该学科主要任务是探明中国植物资源, 编写《中国植物志》, 而将静生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 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所址沿用此前之陆谟克堂; 而文津街房屋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部(附录15)。并将此两所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纳入植物分类研究所, 名之为工作站, 即庐山森林植物园改为庐山工作站、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昆明工作站, 西北植物调查所改为西北工作站; 另将“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高等植物研究室迁往南京九华山, 改名华东工作站。罗宗洛主持之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成立的生物实验研究所, 其后又单独成立植物生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又在上海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 由“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合组而成, 并将植物研究所藻类研究室并入其中。而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欲脱离中山大学而加入中国科学院系统, 却不被中山大学同意; 待1954年教育部决定在大学中不办研究所, 始才改隶于中国科学院, 更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 而原所属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也一同改隶于中国科学院, 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 研究机构无论公立还是私设, 对此改组合并多表赞同, 只有被新政府接管, 才能获得经费, 事业才可发展; 惟有秉志还保持其办所初衷, 对其私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还想保持其独立性, 而不愿被公家接管; 其时, 上海尚有私立企业, 秉志还想借助于他们的捐助, 以维持其研究所; 然而在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趋势之下, 秉志借鉴美国韦斯特解剖生物医学研究所以社会捐款获得经费之模式几无可能, 其本人只得加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关于各研究机构的相关著作详见附录16。

致谢: 本文中英文翻译由庐山植物园胡騫先生完成, 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张健 责任编辑: 黄祥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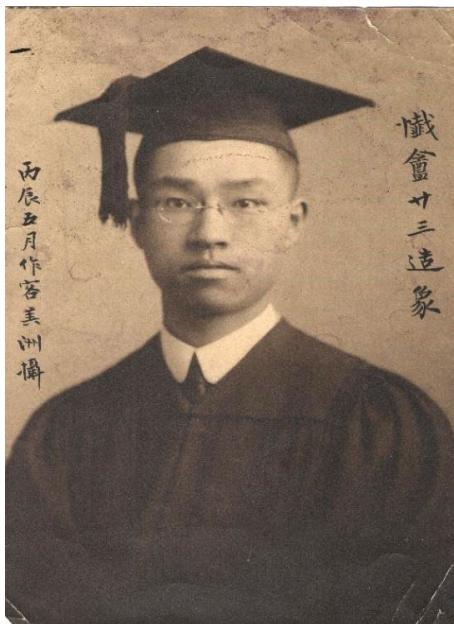
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5235>



附录1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之秉志

Appendix 1 Chi Ping during his academic ten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附录2 在加州大学留学时之胡先骕

Appendix 2 Hsen-Hsu Hu during his academic ten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附录3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教授与学生合影。前排右2胡先骕、右5农科主任邹秉文、右6校长郭秉文、右7副校长刘伯明。

Appendix 3 Group photograph depicting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of Nanking Higher Teachers College, dated 1920. In the front row, from right to left: the second individual is Hsen-Hsu Hu; the fifth individual is Ping-Wen Tsou, the Director of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the sixth individual is President Guo Bingwen; and the seventh individual is Vice President Liu Boming.



附录4 钱崇澍

Appendix 4 Sung-Shu Chien



附录5 陈焕镛

Appendix 5 Woon-Young Ch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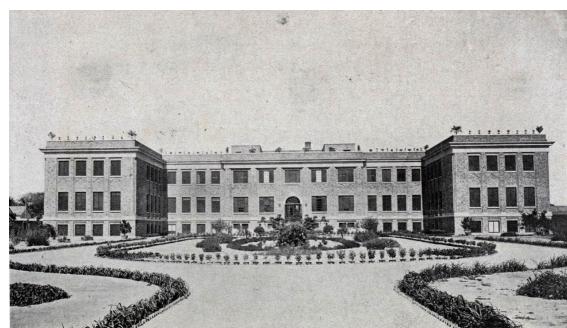
附录6 1925年生物研究所人员送秉志赴厦门大学任教合影。前排右起陈焕镛、秉志、胡先骕。

Appendix 6 Group photograph of personnel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bidding farewell to Chi Ping as he departs for a teaching position at Xiamen University, 1925. Front row, from right: Woon-Young Chun, Chi Ping, Hsen-Hsu Hu.



附录7 1931年新近建成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新楼

Appendix 7 The newly constructed building of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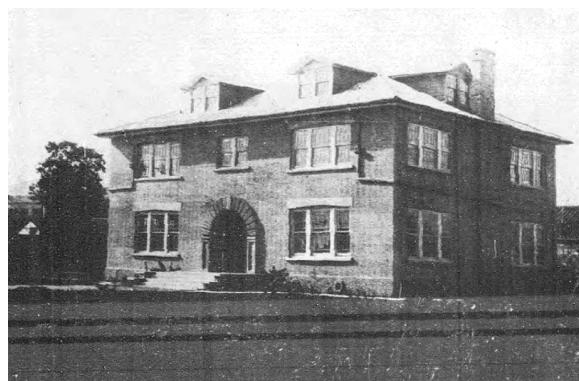
附录8 1931年在文津街三号落成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所址

Appendix 8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located at No. 3 Wenjin Street, in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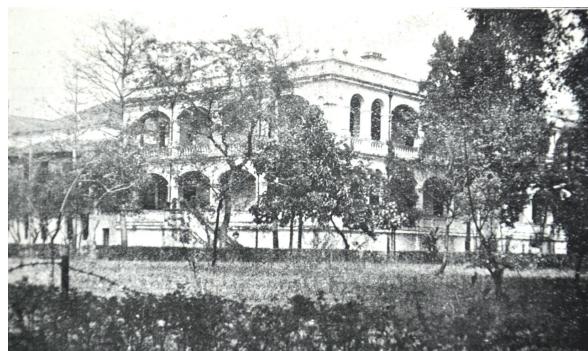
附录9 1936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景观

Appendix 9 Lushan Forest Botanical Garden in 1936



附录10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贤街馆址

Appendix 10 Loc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n Chengxian Street, Nan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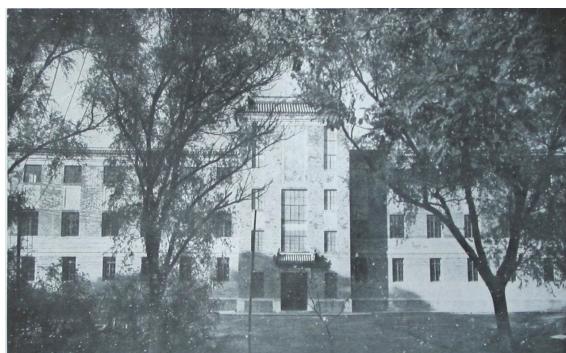
附录11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在广州法政路所址

Appendix 11 The location of the Botanical Institute, Sun Yat-Sen University on Fazheng Road, Guang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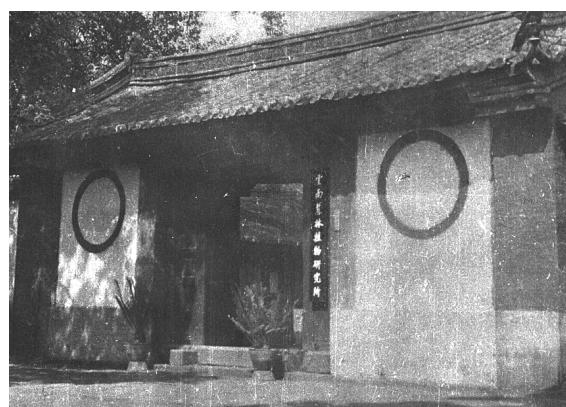
附录12 刘慎谔留学法国时留影

Appendix 12 Tchen-Ngo Liou during his studies in France



附录13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址陆谟克堂

Appendix 13 Lu Mo Ke Hall, site of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附录14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昆明黑龙潭所址

Appendix 14 Location of the Yunnan Botanical Institute at Heilongtan, Kunming



附录15 1950年合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召开第一次全国植物分类学会合影。站席(从左至右，后排): 郑万钧、张肇骞、夏纬瑛、夏纬琨、耿以礼、汪振儒、蒋英、唐进、傅书遐、胡先骕、匡可任、王振华、吴征镒、方文培、刘慎谔、汪发缵、林容、郝景盛；坐席(前排): 黎盛臣、吕列英、汤彦承、冯家文、关克俭、赵继鼎、杨作民、简焯坡、王文采、马毓泉、韩树金、王富全、徐连旺、王宗训。

Appendix 15 Group photograph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nt Taxonomy, conducted subsequent to the 1950 merger that founded the Institute of Plant Taxonom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ront row, from left to right: Standing (l-r, back rows): Wan-Chun Cheng, Chao-Chian CHANG, Wei-Ying Hsia, Wei-Kun Hsia, Yi-Li Keng, Chen-Ju Wang, Ying Tsiang, Tsin Tang, Shu-Hsia Fu, Hsen-Hsu Hu, Ke-Zen Kuang, Chen-Hwa Wang, Cheng-Yih Wu, Wen-Pei Fang, Tchen-Ngo Liou, Fa-Tsuan Wang, Yong Ling, Ching-Sheng Hao; Sitting (l-r, front rows): Sheng-Chen Li, Lie-Ying Lü, Yen-Cheng Tang, Jia-Wen Feng, Ke-Chien Kuan, Ji-Ding Zhao, Zuo-Min Yang, Cho-Po Tsien, Wen-Tsai Wang, Yu-Chuan Ma, Shu-Jin Han, Fu-Quan Wang, Lian-Wang Xu, Zong-Xun Wang.

附录 16 胡宗刚著述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目录

Appendix 16 A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biology history written by Zonggang Hu

胡宗刚, 江西九江人, 生于1962年11月, 自1997年起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机构和主要生物学家传记研究, 现为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 已刊著作目录如下:

- 《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胡宗刚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5月。
-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 胡宗刚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10月
-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胡宗刚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年2月
- 《王文采口述自传》, 王文采口述, 胡宗刚整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12月。
- 《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
- 《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 《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 胡宗刚著, 科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 胡宗刚、夏振岱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 《南京中山植物园早期史》, 胡宗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 《云南植物研究史略》胡宗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 《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早期史》,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 《庐山植物园九十年》, 胡宗刚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 《中国植物学会史——1933–1988年》, 胡宗刚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9月。